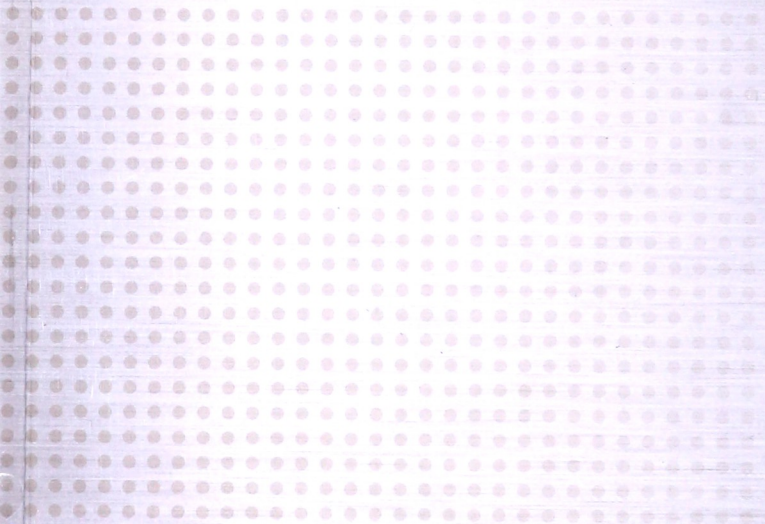


市场环境 与制度变迁

——以清末至民国南昌商人与商会组织为视角

张芳霖◎著



人民出版社

014036355

F729.5
15

市场环境 与制度变迁

——以清末至民国南昌商人与商会组织为视角

张芳霖
◎ 著



F729.5
15



北航

C1715739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于宏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场环境 with 制度变迁:以清末至民国南昌商人与商会组织为视角/

张芳霖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01-012147-5

I. ①市… II. ①张… III. ①商人-研究-南昌市-近代②商会-研究-
南昌市-近代 IV. ①F7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5488 号

市场环境 with 制度变迁

SHICHANG HUANJING YU ZHIDU BIANQIAN

——以清末至民国南昌商人与商会组织为视角

张芳霖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3.5 字数:380 千字

ISBN 978-7-01-012147-5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07JD790001)结项成果
南昌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赣学”经费资助

序

张芳霖教授长期致力于民国南昌商会档案的整理与研究,于2005年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市场环境 with 制度变迁——晚清至民国的南昌商人与商会组织》。此后,又获得南昌大学“赣学”研究与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金的资助,继续深化与拓展这一研究课题。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部学术专著,就是她多年心血的结晶。在本书付梓之前,我有幸先睹为快,兹略作摘要,以为弁言。

本书主要依据南昌商会档案,考察清末民国时期的南昌商人与商会组织。相对于以往的相关研究,本书的主要特色是“在商言商”,即从具体的市场环境 with 经济制度出发,考察商人与商会组织的生存状态和发展策略。作者认为,商人与商会组织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必然受到特定的市场环境 with 经济制度的制约。因此,研究清末民国时期的商人与商会组织,应该以考察当时的市场环境 with 制度变迁为必要前提。同样的道理,研究中国近代的市场环境 with 制度变迁,也必须深入考察商人与商会组织的市场经济活动。

清末时期,江西的市场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南昌逐渐发展为区域性市场中心。清代江西的传统区域市场,由于受到一口通商制度的制约,形成了南北两极市场格局。五口通商和九江开埠以后,强化了南昌作为区域市场中心的地位,促成了江西区域市场的统一。与此同时,清末对外通商的发展、新式工商企业的出现和经济制度的变革,导致了市场环境的日益复杂化。传统的行会、商帮、会馆等商业组织,难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和经济制度的要求,因而需要建立统一的商会组织。1906年创建的江西商务总会,对于推进江西区域市场的统一、整合传统的商业组织和建立新的市场秩序,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民国时期,市场环境与经济制度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南昌的商人与商会组织不断调整其发展策略。北京政府时期,由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地方自治制度的推行,商人在地方社会中空前活跃。由商会参与制订的《商会法》及《同业公会规则》,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了商会及同业组织的权益,确立了商会在政府序列中的地位。这一时期的商会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在改善市场环境和维护市场秩序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政府实行高度集权的党国政治,使商会的政治地位日益边缘化。自上而下推行的各项工商业制度及新《商会法》和《同业公会法》,削弱了商会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南昌正式设市后,加强了对商会的归口管理,使之成为地方政府管理商人和商业活动的行政工具。“新生活”运动中,南昌市商会创设“商人节”,试图重返城市社会生活的中心。

全面抗战时期的经济统制政策和商会内迁,使南昌的市场环境急剧恶化。南昌沦陷后,在日伪政权的高压统治下成立了南昌市商会筹备委员会,成为控制商人和市场的主要工具。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商会组织仍是商人自我保护和相互联结的重要形式,艰难地维系着本市的商业活动。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加强了官僚资本对工商业的垄断和控制,普通私人企业主的经济自主性和独立性逐渐丧失,商会的运作也日益受制于政府及少数特权商人阶层。为了维护同业利益,南昌商人在商会之外组织了商社,导致了商会组织的分化。在商社这一特有的组织形式下,集结了普通商人的力量,促成了南昌商会的重组。

清末民国时期的商会及同业公会,既是中国近代市场环境 with 制度变迁的历史产物,又受到市场环境 with 制度变迁的深刻影响。当近代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制度初创之际,商会及同业公会对维护市场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不断加强、国家垄断资本日益渗入,尤其是企业的国有化和经济的全面统制时,商会和同业公会必然趋于边缘化,成为政府控制市场经济活动的一种工具。然而,无论市场环境是否宽松、经济制度是否健全,商会及同业公会作为商人的自治团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具有不断自我调适与灵活应变的能力。因而,离开了具体的市场环境和制度变迁,难以真正理解中国近代的商人和商会组织。

本书的学术贡献,首先在于对清末民国时期的南昌商人和商会组织作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填补了中国近代区域商会研究的一大空白。其

次,本书从清末民国时期的市场环境 with 制度变迁,考察商人与商会组织的生存状态和发展策略,为中国近代商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作出了有益的理论探索。其三,作者对南昌商会和同业公会档案的发掘和整理,为商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来源,对深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也不无裨益。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充分利用档案资料的基础上,收集了大量的报刊、谱牒、传记、文集等历史文献资料,对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了深入的个案研究。因此,本书不仅是逻辑严密的通论之作,更是有血有肉的历史叙事,具有鲜明的可读性。

我对商会史研究涉猎不多,以上所述仅为一孔之见。是耶非耶,留待读者诸君评说。是为序。

郑振满

2013.10.1 于鹭岛浪琴苑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九江开埠与江西区域市场的转型	15
第一节 江西传统区域市场	15
一、江西市场的生态条件	15
二、南北两极市场格局的形成	22
第二节 九江开埠及其影响	26
一、九江开埠的历史过程	26
二、九江对江西市场的辐射作用	33
第三节 南昌区域中心市场的形成	43
一、两极的弱化与区域市场格局的转变	43
二、南昌商品集散地的形成	48
第二章 鼓励工商与倡设商会:清末江西商务总会	54
第一节 传统商人与商业组织	54
一、南昌的传统工商业	54
二、行会、商帮与会馆	58
三、厘金、捐纳与商人的士绅化	68
第二节 新式工商企业与新型商人	75
一、清末工商奖励制度与章程	75
二、官、商办工商企业及行号	81
三、新旧商人角色的转变	89
第三节 清末江西商务总会	100
一、商部、农工商部与商会	100

二、江西商务总会的成立·····	106
三、江西商务总会的运作·····	114
第三章 商会法与统一市场:1912—1927年南昌总商会 ·····	120
第一节 工商制度与商会法规 ·····	120
一、鼓励工商制度的延续·····	120
二、市场制度的统一·····	124
三、商会法与同业公会规则的颁布·····	128
第二节 江西南昌总商会与市场环境 ·····	132
一、江西南昌总商会·····	132
二、南昌金融业与市场环境·····	136
三、商会对市场秩序的维护·····	143
第三节 南昌总商会与地方政局 ·····	163
一、民国初期南昌的政治格局·····	163
二、南昌总商会与地方自治·····	167
三、南昌商人与地方社会·····	175
第四章 新商会法与行业秩序:1927—1938年南昌市商会 ·····	182
第一节 工商政策与新商会法 ·····	182
一、新《商会法》与《工商同业公会法》的颁布·····	182
二、南昌设市与城区经济·····	188
三、南昌市商会与同业公会·····	196
第二节 南昌市商会与新生活运动 ·····	214
一、新生活运动·····	214
二、南昌“商人节”·····	220
第三节 南昌市商会与市场秩序 ·····	226
一、商事习惯与纠纷调解·····	226
二、商品流通与行业秩序·····	240
第五章 战时经济统制与动荡:1938—1945年南昌市商会 ·····	248
第一节 抗战时局与募捐活动 ·····	248
一、南昌市商会与抗战时局·····	248

二、南昌市商会的募捐活动·····	251
第二节 经济统制政策与商会南迁·····	261
一、经济统制与商会管制·····	261
二、商会及商号南迁·····	266
第三节 沦陷时期的伪南昌市的商会·····	269
一、日伪统治下的伪南昌市商会与同业公会·····	269
二、军管制下的市场环境·····	277
三、伪南昌市商会的主要活动·····	280
第六章 战后重组与市场恶化:1945—1949年南昌市商会 ·····	299
第一节 复员与接收·····	299
一、南昌市商会的复员·····	299
二、接收敌伪商会·····	305
第二节 商会的分化与重组·····	313
一、商会改选与商社的成立·····	313
二、商社的活动与功能·····	318
三、商会的重组·····	324
第三节 市场的恶化与商会的对策·····	326
一、市场环境恶化与应急制度·····	326
二、商会的救市努力·····	331
结 语 ·····	341
参考文献 ·····	353
后 记 ·····	363

导 言

本书主要依据现存的民国南昌商会档案及相关文献,以清末民国南昌商人和商会组织为视角,从市场环境和制度变迁的历史维度,探讨市场环境与经济制度制约下的南昌商人及商会组织的时代特征与演变趋势,进而揭示中国近代市场环境与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

一、问题与思路

清末特定历史环境造就了诸多制度的创设,商会组织的出现是这一时期制度的产物,也是时代的产物。从全国总商会到各省市县及通商大埠商会组织的建立,商会及同业公会逐渐渗透到社会经济方方面面,也成为清末民国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之一,因而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早期对商会的研究,是作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个领域被拓展的,把商会作为大资产阶级、大买办控制的旧社团,具有明显的政治史色彩。以后深化了对商会本身的研究,涉及商会成员构成及领导权问题、商会的社会属性问题、商会与政府关系、商会与传统行会组织研究。1980年代以后,在商会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有了长足的进展,开始突破政治史的视角,开拓了商会的结构与功能、商会的经济与政治作用、商会外交等研究。1990年后还引入了现代化理论与市民社会理论,逐渐形成新的解释体系。但这些研究在地域上,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或开埠较早的城市,在时段上,大多数则局限于1927年前的商会研究。

然而,纵观商会组织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商会组织在不断经历改组、分化与重组,商人本身也一直在变,他们的地位、经商的态度、对市场的作用等在不断改变,这些变化的背后是市场环境的变化,经济制度的创设和相关

法律的确立。因而对于商会组织的研究,不能将商会停留在某个阶段,更不能仅仅强调商会的政治作用及历史意义,而必须“在商言商”,将它放在长时段的特定的市场环境 with 制度下去考察它的演变趋势。因为商人与商会组织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必然受到特定的市场环境 with 经济制度的制约,因此,研究清末至民国的商人与商会组织,应该以考察当时的市场环境 with 制度变迁为必要前提。反之,也只有在此层面上了解了作为经济主体的商人与商会组织,才能加深对市场 and 制度的理解。

近代市场环境 with 制度的研究也是我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随着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张,我国被动地纳入世界市场体系,我国通过一系列经济制度的创设,逐渐改变了过去市场主体分散,交易成本环节过多,交易成本昂贵等状况。股份公司出现,新型交易机构建立,商会作为调控市场的作用也日益显现。以往诸多的相关研究集中在对中国近代市场发育及市场制度本身的研究,而忽略了对市场主体商会及组织的研究,特别是缺乏经济史的实证个案研究,因而,从一个区域长时段研究市场主体的商人及其组织活动,有利于理解市场环境 with 制度的内在机制,从而推动近代市场环境 with 制度的研究。

面对中国近代市场环境的不不断变化和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商人的经营方式与商业组织也必然随之而改变。那么,在近代市场环境 with 的演变过程中,新式的商人与商会组织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在近代的国家制度创新过程中,商人与商会组织又是如何自我调适与应对的?换言之,在中国近代市场环境 with 制度变迁的大背景下,商人与商会组织的行为策略有何时代特征及演变趋势?笔者希望,通过考察清末至民国南昌商人与商会组织的市场经济活动,推动中国商会史的研究,同时也有助于深入探讨中国近代市场环境 with 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以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本文之所以以南昌商人与商会组织为研究视角,主要是由于南昌特定的区位因素及资料基础。南昌虽然地处内陆,但通过九江和鄱阳湖与长江流域诸港如上海、汉口相联,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并非完全孤立和封闭。九江开埠后,九江成为江西大宗商品的转运枢纽,江西迅速纳入现代世界贸易体系。南昌作为近代江西的省会城市,凭借其政治军事地位和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形成辐射全省的区域市场中心。近代的南昌也是多事之地,南昌商人在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在维护市场秩序以及制度创新方面都是有所

为与不为,因此,清末至民国南昌的商人与商会组织的研究,可以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具有一定区域性视角的个案,以加深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商人的认识。更为难得的是,南昌市档案馆和江西省档案馆保存有几千份直接、系统而丰富的民国商会档案,这些档案充分反映了南昌商会、同业公会和商人的活动脉络,可以将商会放到一个近代市场环境与制度下动态去考察其内在的发展机制。

为了使本文的论述更为符合学术规范,拟借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与市场学的某些概念作为分析工具。新制度经济学包括科斯的产权理论、威廉姆逊的交易成本理论和诺思等的制度创新理论。在西方经济史研究中,诺思的制度创新理论解释了近代经济增长的制度原因以及制度变迁的规律,因而最负盛名。他在《西方世界的兴起》^①中指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在诺思看来,有效率的组织只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的活动。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②中,诺思运用交易成本、公共产品、相对价格等分析工具,系统地构建了经济史理论体系。新制度经济学特别关注经济活动中人的因素,注重研究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方式和行为规则、研究各种行为规则的经济影响。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取向和解释体系,对本研究具有启迪意义。研究中对近代中国制度变迁的分析,将尝试借鉴和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公共产品、经济组织和产权制度等概念工具。

任何理论解释体系和概念工具,只有切合历史实际才具有意义。因此,本研究力求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从具体的历史资料中寻找中国近代市场环境和制度变迁的轨迹,揭示南昌商人与商会组织的时代特征及其演变趋势,以期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① [美]道格拉斯·C.诺思、[美]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宁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② [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二、学术史回顾

在中国近代史上,商人与商会组织曾经是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之一,因而受到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也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关于中国近代商人与商会组织的研究,前人已作了一系列的学术史回顾^①,为了解相关研究成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此着重从不同的研究取向和问题意识出发,对以往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与评述。

1. 国外研究状况

国外对中国商会的研究起步较早,但研究是零星的。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一些在华日本人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对商会的活动进行考察。之后,根岸佑和小岛淑男研究辛亥革命时涉及商会,而曾田三郎和仓桥正直则直接以商会为题。法国学者白吉尔(Marie Claire Bergère)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中也以上海商会为例。美国的 John S. Burgess、利维(Marion J. Levy, Jr.)、张鹏(Chang Peng)、桑福德(James C. Sanford)、柯布尔(Parks Coble, Jr.)^②,或与区域经济和商帮有关,或与商会有关。1992 年,章开沅先生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北美亚洲学会第 34 届年会上,首次向海外介绍天津商

① 主要参见朱英:《清末商会研究述评》,《史学月刊》1984 年第 2 期;徐鼎新:《中国商会研究综述》,《历史研究》1986 年第 6 期;赵洪宝:《近几年来大陆学者关于中国商会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 16 期;虞和平:《近八年之商会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 年 4 期;马敏:《近十年来中国的商会史研究及其展望》,“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2000 年;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之现状与展望》,《近代史研究》2003 年第 2 期;冯筱才:《中国大陆近代商人之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 26 期。

② Marion J. Levy, Jr. & Shih Kuo-heng, *The Rise of the Modern Chinese Business Class*,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9. Chang Peng, *The Distribution and Relative Strength of the Provincial Merchants Groups in China, 1842-1911*,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58. James C. Sanford, *Chinese Commercial Organization and Behavior in Shanghai of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Ph. 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Parks Coble, Jr.,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会和苏州商会档案的史料价值,引起海外学者的极大兴趣,此后研究中国近代商会的海外学者才逐渐增多,遍及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地。如美国学者罗威廉(William T. Rowe)对汉口的研究^①,日本学者小滨正子等对商民运动、上田贵子对奉天商会以及顾琳对直隶高阳商会的研究^②。陈锦江(Wellington K.K. Chan)虽以《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③为题,但却用了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了商会在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以上海商会与广州商会为举证对象。

2. 国内研究状况

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国内商会史的研究起初得益于苏州商会档案的发掘。此后,在章开沅、胡光明等早期商会史研究专家的呼吁下,北京、上海、天津、苏州等地档案馆都计划整理本地商会档案。先后出版有章开沅、刘望龄、马敏等主编的《苏州商会档案丛编》;胡光明、蓝长云主编的《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50)》;复旦大学与上海市工商联会合作的《上海总商会组织史料汇编》。正是由于在整理、出版商会档案方面的重要进展,20世纪90年代商会史研究才取得丰硕成果。

由商人阶级属性到商会史研究。国内对近代商人的研究发轫于民族资产阶级研究,具有明显的政治史色彩。1949年以前,有很多见诸报端的此类时论文章。1949年以后的近代商人组织即商会史研究,最初是作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个领域被开拓的,把商会视为大资产阶级、大买办控制的旧社团,如章开沅、刘望龄的《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④和黄逸峰的《五卅运动中的大资产阶级》^⑤。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了拓展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视野,

① William T.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69-1889*, Sr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r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② [日]顾琳著,王玉茹、李进霞译:《中国的经济革命:二十世纪的乡村工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日]小滨正子著,葛涛译:《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日]上田贵子:《就工商人[业]资本家的籍贯来看的中国东北地区》,香港“第三届中国商业史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2000年。

③ [美]陈锦江(Wellington K.K. Chan):《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王笛、张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④ 章开沅、刘望龄:《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江汉学报》1961年第2期。

⑤ 黄逸峰:《五卅运动中的大资产阶级》,《历史研究》1965年第3期。

章开沅提出：“过去，我们对资产阶级的研究，往往侧重于个别企业主的经济活动，这自然是必要的，却又是不足的。应该扩大我们的科学视野，要从这个阶级的整体着眼，认真考察他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譬如商会，我们一向就研究甚少，其实这是从整体上考察资产阶级不可缺少的重要课题”。^① 在1983年召开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上，他再次强调了商会史研究可以弥补类型研究和个体研究的不足，深化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章开沅教授的见解引起史学界的普遍关注和共鸣，推动了中国商会史的研究热潮。不过，这一时期商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主要围绕商会的阶级属性，基本上“被置于社会阶级分析模式之下的，并成为对资产阶级进行集团分析的一个样本，而分析的动机则是为了更清楚地把握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态度和动向”。^②

经济史及社会史意义的商会史研究。1985年之后，商会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较以前有了长足的进展，开始突破政治史的视角，开拓了商会的结构和功能、商会的经济和政治作用、商会的外交活动、中外商会比较、地方商会研究等新领域。

虞和平《近代商人的法人社团性质》一文，按照社会学原理，确定商会的法人社团属性，认为这种属性特征贯穿于商会的目的认同体系、成员资格界定、组织协调系统和社会整合功能之中，“是商会组织的根本社会属性”^③。马敏在《清末苏州商会组织系统试论》一文中，认为苏州商会组织不只是若干彼此孤悬的实体——商务总会、分会或分所，而是既包括实体也包括关系的作为有机整体存在的组织系统，苏州商会总会与分会、分所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种沿官方规定和实际调整合力方面形成的特殊组织控制系统；而相对于总会而言，分会是一被控系统；而相对于分所，分会又成了控制系统。^④ 马敏的《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绅商》^⑤和《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⑥，则注意到晚清苏州商会组织对城市社会

① 章开沅：《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载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4页。

② 冯筱才：《中国大陆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③ 虞和平：《近代商会的法人社团性质》，《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④ 马敏：《清末苏州商会组织系统试论》，《江海学刊》1988年第6期。

⑤ 马敏：《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绅商》，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4年。

⑥ 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

生活的广泛影响,指出以商会为核心,众多民间社团组织纵横交错,形成一个官府以外的“在野市政权力网络”,城市绅商通过这种“权力网络”,控制了相当一部分市政建设权、司法审理权、公益事业管理权、社会治安权以及工商、文教、卫生等多方面的管理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这些研究虽然没有冠以源于西方的“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理论,但也可以看出明显的社会史研究取向。

对各地商会与中外商会的比较研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商会史研究的新视野。朱英在《清末苏州商会的历史特点》一文中,通过与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商会的比较分析,论述苏州商会的产生原因。^①朱英的《近代中外商会比较研究》,从中外商会的产生、职员设置、组织体制以及商会活动内容、权限和影响等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的比较分析。^②虞和平在《论清末民初中美商会的互访和合作》一文中,详细解剖了发生于清末民初的中美商会的互访和合作活动,认为在此互访和合作中,中方不仅相应扩大了对美贸易,而且进一步了解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状况,增强了学习美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意识,加速了中国资产阶级从地区的联合走向全国的联合、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前进步伐。^③

商会网络与制度变迁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以后,除了关注商人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角色意义的研究外^④,在商人组织的研究中,开始注重国民政府时期的商人组织研究,如朱英的《再论国民党对商会的整顿改组》、郑成林的《1927—1936年国民政府与商会关系述论》、齐晓红、郑长兴等的《建国前商会档案概述》、宋美云的《沦陷时期的天津商会》、李柏槐的《民国时期商会与同业公会之关系:以1929年至1949年的成都市为例》以及魏文享

① 朱英:《清末苏州商会的历史特点》,《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

② 朱英:《近代中外商会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5期。

③ 虞和平:《论清末民初中美商会的互访和合作》,《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④ 阎广芬、田正平:《近代商人与教育变革》,《文史哲》2004年第1期;《近代商人捐资兴学的方式及其办学特点》,《当代教育论坛》2002年第9期;《近代商人的教育理念及其办学特色》,《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2年第6期。